



陈晏清文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

陈晏清文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晏清文集 / 陈晏清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5

ISBN 978-7-201-05507-7

I. 陈… II. 陈… III. ①陈晏清 - 文集②哲学 -
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28465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46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787 × 1092毫米 16开本 34.75印张 3插页

字数: 450千字 印数: 1-1,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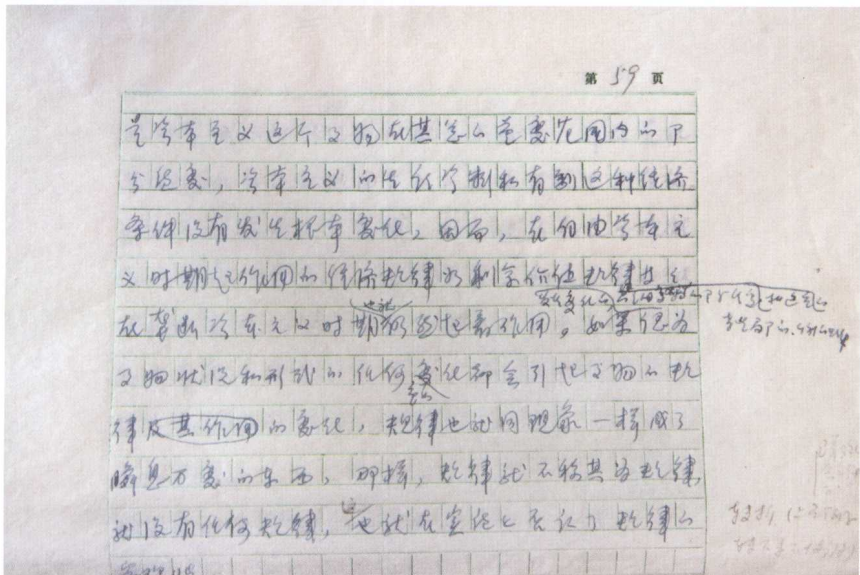
定 价: 78.00元



作者近照



作者主要著作



作者手迹

目 录

代序言	“返本开新”	——我的学术活动历程	(1)
-----	--------	------------	-----

哲 学 观

民族的振兴亟须鼓舞理论探索精神	(17)
理论应以理论的方式为改革服务	(22)
《哲学思想宝库经典》导言	(29)
让哲学以全新的大气象迈向 21 世纪	(47)
哲学应是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	
——关于哲学研究的现状和出路的对话	(50)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60)
哲学的实践转向和领域哲学的兴起	(66)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版本和理论版本	(72)
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视野	
——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论域》	(80)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88)

哲学体系改革

哲学应重视主体性问题的研究	(105)
按照“实践唯物主义”的原则改造哲学体系	(109)
哲学教材体系改革的探索	(117)
关于实践观点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的地位的再思考	(126)

《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引论	(140)
将实践观点贯通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150)

唯物辩证法

论矛盾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165)
如何讲授“对立统一规律”	(178)
矛盾同一性的含义及其与矛盾斗争性的关系	(189)
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理解同一性的含义	(199)
“对立统一规律”讲授意见	(211)
“对立统一规律”等词条释文	(221)

唯物史观

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资产阶级法权	
——批判“四人帮”在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的谬论	(231)
“四人帮”上层建筑决定论批判	(240)
应着重从社会历史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王国”的理论	
——兼与李延明同志商榷	(259)
论文化观念变革的意义	(267)
文化的新生与社会发展	(278)
“社会进步”观念的更新及其意义	
——重读《展望二十一世纪》	(283)
重建新世纪的价值观	(288)
历史规律·历史趋势·历史预见	
——评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294)

社会哲学

中国社会大变动的哲学思考	(305)
社会主义的信念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信念	(339)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代价问题	(341)
社会哲学:哲学改革的一条新思路	(351)
社会哲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	(356)
关于社会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372)
“社会哲学研究丛书”主编的话	(383)
社会哲学的视野与意义	
——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进路的一种思考	(387)
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观念的核心问题	(400)
社会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414)

政 治 哲 学

社区文明建设的时代意义	(429)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意义	(433)
市民社会观念的当代演变及其意义	(446)
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个人权利与公共伦理	(464)
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及其意义	(476)
后形而上学转向与政治思维方式的变更	(486)
政治哲学的时代使命	(495)
政治哲学的兴起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政治哲学的建构	(500)

序 文

《人类活动论导引》序言	(511)
《文化认识论引论》序言	(514)
《论社会有机体的性质、结构与动态》序言	(516)
《进步观念的当代重建》序言	(520)
《全球化与生态文明论纲》序言	(522)
《市民社会论》序言	(524)

《儒家经济伦理与市场社会精神》序言	(529)
《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序言	(532)
《创新:由危机走向进步的动力》序言	(535)
《走出现代性道德困境》序言	(538)
附录:陈晏清主要著作目录	(542)
编后记	(544)

代序言：“返本开新”

——我的学术活动历程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必须也只能与自己的时代同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哲学发展的过程,是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实践过程特别是其指导思想的变化过程分不开的。我曾经借用新儒家常用的“返本开新”这个词,来概括我国二十多年来哲学发展的历程。所谓“返本”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所谓“开新”就是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局面。实际上,这也是我本人学术活动的历程。就我来说,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活动是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才开始的,我所从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又是现实性和思想性都极强的学科,因此,我个人的学术活动也大体上不可能不遵循这一时期整个国家哲学发展的轨迹。

“返本”的第一步是拨乱反正,即颠倒被“文化大革命”颠倒了的是非。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从哲学上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文章,我也写过几篇,但从总体上看是在零敲碎打,往往不得要领。“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极其沉重的一页。对于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造成如此深重灾难的历史事件,如果不从哲学上加以清算,就不仅难以顺利实现当时的斗争任务,而且将留下无穷的后患。因此,1977年初我萌动了

* 本文为纪念“百年南开”而作,载《南开学人自述》第2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

对林彪、“四人帮”哲学进行系统批判的念头,当时也有一些同事和朋友建议我做这件事。做是想做,但感到底气不足。这样的课题太重大了,我怀疑自己有没有能力去驾驭它。而且,当时不少单位包括一些理论工作者十分集中的大单位,都组织了专门班子在做这件事。我的心理压力之大是可以想象的。写《“四人帮”哲学批判》这本书,从准备到写作,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可以说是全力以赴。在书稿的写作阶段,几乎每天工作 15 小时以上。1978 年春完成初稿,本来想送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当时天津市委的一位同志把它推荐给了人民出版社。没想到稿子寄去不出一个月,人民出版社就答复决定采用,又经过一个时期的修改,于 1979 年 1 月出版面世。这是在我已经 40 岁的时候,在进入理论界二十多年(从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学生算起)之后,做了第一件真正有益的、也比较像样的理论工作。

《“四人帮”哲学批判》是紧密结合于政治批判而对“文化大革命”所做的理论批判,虽有一定的系统性,但还是比较粗浅的。而且“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思想根源来说,它的发生是长时期背离党的思想路线的结果。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还有许多的理论工作要做。当时北京的一位朋友邀我加盟写一本中国现代哲学史(他指的“现代”是 1949 年建国以后,实为“当代”),其用意也是要清理建国以来的哲学思潮。这用意本来是很好,但我考虑写史与写论还是不太一样,害怕由此陷进理论界内部人际关系的是是非非,便借故推辞了。不过这样的工作,我还是要做的。

当年毛泽东同志针对某种现象说过“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这样的话。固然毛泽东所指向的和后来人们所观察和体悟到的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把他的话语视为对于我们国家一个时期里哲学状况的总体描述也似无不妥。“唯心主义横行”的突出表现就是唯意志论,忽视和藐视客观规律。而这种唯意志论却常常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主观能动性理论的外衣出场的。在一个时期里,主观能动性成了盲动性和狂热性的代名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能动性学说这样一个理论内容极

为丰富而深刻的哲学学说,被归结为几句耸人听闻的时髦口号。这种以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主观能动性理论为特征的唯意志论,在实际生活中造成的恶果是极其严重的。因此,我在完成《“四人帮”哲学批判》一书的写作之后不久,便着手撰写《论自觉的能动性》一书,于1981年完稿,1983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所谓“形而上学猖獗”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斗争哲学”的猖獗。这个斗争哲学不只是指那种“整人哲学”,它主要是指在对立面的同一和斗争这两个方面中,只讲斗争不讲同一这样一种形而上学。如果只讲斗争不讲同一,那么在说明事物的发展过程时,就只讲分化、变革而不讲统一、稳定,只讲绝对的变动性而不讲相对的稳定性。例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破字当头”等等都属此列。这种以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为特征的斗争哲学,在实际生活中造成的恶果同样是极其严重的。因此,我在这一时期(大体上与写作《论自觉的能动性》一书同时)对于辩证法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对立统一规律,特别是关于矛盾同一性的作用问题进行的。大概可以说是在我的文章中最早(如果不是最早也是较早)阐发了恩格斯的一个重要思想,即辩证法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每一个阶段对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①同时,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矛盾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为了正确地阐明同一性的作用和整个对立统一规律,我又提出重新规定“同一性”的范畴,不赞成多年沿袭的将“同一性”规定为“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观点,而主张将其规定为“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和相互贯通”,因为转化和斗争属于同一种倾向。最后,我还大胆地提出整个地改变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述方式。这些意见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并被权威教科书和辞书采纳。教育部统编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肖前主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对立统一规律”一章由我执笔,《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的“对立统一规律”、“矛盾”、“矛盾的斗争性”、“矛盾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3页。

同一性”等条目,都由我撰写。

上述这些,都是我所说的“返本”的第一步即拨乱反正的工作。就全国来说,这一工作大体上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告一段落。这项工作固然是十分必要的,但它基本上仍局限于旧的理论框架之内。从学术进步的角度说,虽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基本理论有了结合实际的新阐述,但多限于单个的理论观点,哲学的整体推进还谈不上。到了 80 年代中期,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兴起,社会问题、思想问题层出不穷,原有的哲学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新的情况、解决新的问题,哲学越来越显得苍白无力。当时学界和社会上都有所谓“经济(指经济学)繁荣,哲学贫困”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国哲学状况的总体性思考不能不提上议事日程,哲学体系改革的呼声也就越来越高。

这里说的“哲学体系”,主要是指以教科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体系。毫无疑问,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的哲学变革,从根本上说都是由社会生活的变革推动的,当代中国的哲学变革也不例外。哲学变革的根本原因是它不能满足中国社会变革实践的需要,已如上述。但中国有一个几乎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具备的特点,即它可以说是一个“哲学大国”。高中以上的学校都开设哲学课程,各级各类干部都要学习哲学,哲学教育的成败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因此,更多的人是直接 from 哲学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感受到哲学变革的需要的,人们把哲学改革的热情和精力首先投注于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改革,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平心而论,改革前的哲学教科书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有其不可抹煞的历史作用,我们这些人大多是通过这些教科书走进哲学的大门的。把改革前的哲学教科书说得一无是处,这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我是完全不赞成这种态度的。过去那些编得比较好的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阐述是正确的,但是,它作为“体系”,作为对于马克思哲学的解释框架又确实有其严重的缺陷。旧的教科书体系之所以要改革,不是因为它有错误,而是因为它有缺陷,缺陷不等于

错误。旧的教科书体系的最主要的缺陷在于主体性维度的缺失,即纯客观主义的倾向或本体论化的倾向。哲学似乎只是在心平气和地静观世界,只是在描绘世界的图景即单纯地解释世界。似乎这个世界并不是人创造的,它和生活在其中的人没有什么关系,人在这个世界中如何生活、是什么样的生存状况,都几乎难以进入哲学的视野。这种纯客观主义的倾向实际上是一种旧唯物主义的倾向,是一种前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哲学特征。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不是单纯“解释世界”的哲学,而是“改变世界”的哲学。它的出发点既不是抽象的精神,也不是抽象的自然,而是现实的人即从事现实活动的人。现实的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从事对象性活动的存在物。哲学从现实的人出发,它所关注的便是人的对象世界即同人发生对象性关系的世界,而不是抽象的、同人无关的世界。哲学思考指向人的现实活动或从事现实活动的人,即指向人类世界,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主体性维度”。这是哲学观念、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改革前的教科书丢掉了主体性的维度,不仅不能表达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且就其所表现的哲学思维方式来说,是一种向旧哲学即前马克思哲学的倒退。旧的教科书解释框架是从前苏联照搬过来的,哲学体系的改革,就是要清除前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因此,我把这个工作也叫做“返本”,是“返本”的第二步工作。从理论和学术的深层上看,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返本”。所谓“返本”就正是要返回到学说的创始人那里去,返回到原创性学说去,这样才有可能有效地剔除后人附加于它的东西而把它的真精神剥离出来。因此,它比“返本”的第一步工作更加重要,影响更加深远。

对于哲学体系的改革,我是持积极态度的。一是建构一个能够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的解释体系,对于改进我们的哲学教育和哲学研究实在是太重要了,这件事情不能不做。二是我觉得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负有更大的责任。在此之前,我一直参与了教科书的编写工作,除了参加肖前教授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编写之外,1982

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聘我做哲学课的主讲教师时,我又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编写了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当然也是按照旧的框架编写的。这本书印刷约二十次,发行二百余万册,不仅为“电大”使用,也为一些普通高等学校采用。当时的许多哲学教师都用过这本书,因为各地“电大”要请他们作辅导。到了后来,这本教材的印数之多、发行之广,就不再使我感到欣喜,而是感到不安了。当我对于旧的教材体系的缺陷理解得越来越深刻的时候,这种不安也就越来越强烈,因而特别希望有一个纠正和弥补的机会。我的老师肖前教授在“文革”前就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编写组的主要成员,“文革”后又又是教育部统编教材的主编。按说他可以算是在中国的旧哲学教科书体系的主要代表,体系改革首先就是改他编的书,然而,肖前老师对于哲学体系的改革却抱着非常积极的态度。他的这种精神使我深受教育。我认为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当具备的品质,我应当学习这种品质。

哲学体系改革的研究得到了国家的有力支持。1985年原国家教委设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改革”的重点课题,翌年又被提升为国家社科规划的重点课题,由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博士点共同承担。课题组由著名哲学家肖前教授、黄楠森教授主持,由十余位博士生导师和著名教授组成。当时,南开大学已获准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博士点,是全国高校仅有的六个博士点之一,我也就作为南开博士点的带头人加入了这个课题组。这个课题组的活动长达八年之久,在全国哲学体系改革研究中确实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它成功地举办了几次与本课题相关的研讨会,对由哲学体系改革所引发的、席卷全国的关于主体性问题和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大讨论,起到了推动或带动的作用,把哲学体系改革的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这一课题研究的最终成果,就是新编哲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下册)。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一书由肖前教授任主编、黄楠森教授和我

任副主编。肖、黄二老德高望重,当之无愧。我显然不具备这个资格,只是因为肖、黄二老年事已高,我当时才五十出头,正“年富力强”,需要我多干点活儿罢了。这真是一个苦差。在协助肖前教授统稿的过程中,可以说遇到了我在以往的研究和写作中从未遇到过的困难。一是因为这个课题的研究无论对谁来说都还不十分成熟,二是因为在许多问题的理解上还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所以交上来的初稿真是“各具特色”。不做大改吧,不行,因为同一本书总得在逻辑上大体能够自洽,在风格上大体能够一致;做大改吧,又不敢放开手脚,因为各章的第一执笔人都是哲学大家,大多是我的师长。所以,这本书虽然总结了哲学体系改革研究的积极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但还是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1988年年初,由我们南开大学负责筹办,在天津开了一次课题组的研讨会。这次会上,课题组内部在认识上的分歧已充分显露。我认为这种分歧的存在是很正常的,强求统一既无必要也不可能。那时,我就对课题的最终成果将是什么面貌有所预感,但又不想放弃自己的意愿和观点。于是,我决心“另搞一套”。一方面,积极参加课题组的活动,后来让我做副主编时尽心尽力协助肖前教授和黄楠森教授把书编好;另一方面,我又在南开大学组织队伍进行独立的研究。我指导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王南湜、李淑梅是1986年入学的,这正是课题组成立的时候,他们俩便随我一起自始至终参加了课题组的主要活动。王南湜的博士学位论文《人类活动论导引》就直接是做的这个课题。应当说,在保证研究的深入、思路的一致等方面,我们这个小课题组比那个大课题组有更多方便之处。这个时期,我们是“左右开弓”,“大”“小”并进。我们的研究活动与课题组的研究活动几乎同时起步,也几乎同时结束,大概都是相距两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于1994年出版,我们撰著的《现代唯物主义导引》于1996年出版,后来又改编为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于2001年出版,供研究生使用。这本书是力求将实践的观点贯彻全书的。它立足于实践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基本形态、基本特征以及马克思确立的一系列哲学“大观念”提出了新的理解,并比较全面地涉及了自然哲学、社会理论、认识论、伦理学、美学、辩证逻辑、西方哲学等各分支学科的基础理论问题,也比较注意各个部分之间的内在关联和首尾贯通。应该说这也是哲学体系改革的一项积极成果。

哲学体系改革时期是我国哲学发展过程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编写了新的教科书,构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解释体系,而且更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整体推进。在对旧的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批评中,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有了更正确的理解。我本人和我领导的学术群体经过这长达十余年之久的哲学体系改革研究之后,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的意义,主要在于它以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取代了旧的哲学思维方式,如同历史上经过所谓“认识论转向”而实现了由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的转变一样,马克思实现的实践论(或人类活动论)转向则引导了由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变。哲学应指向人类世界,就是哲学应面向实践,面向人的现实生活,为人类生活提供一种植根于现实的终极意义的关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这种真精神的恢复,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于马克思哲学中实践论思想的深入发掘,无疑会对改造我国的哲学教育和哲学研究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在此后一个时期的研究方向的选择,就是从这种理解出发的。

哲学体系改革的研究于90年代告一段落,也就是我所说的“返本”工作告一段落。返本不是目的,返本是为了开新。返本和开新也不是截然分开的,不是在某一个早上宣布返本已经完成,开新立即开始。返本中就包含了开新。但是,将返本和开新作为两个阶段加以相对的区别,在对我国新时期哲学发展过程的理论认识上还是有意义的。

按照我的理解,“开新”应是一种原创性的研究。“开新”就是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就包括某些理论原理的更新甚至是理论形态的更新。这就必须探寻哲学的新的生长点。这个生长点显